

钓鱼台 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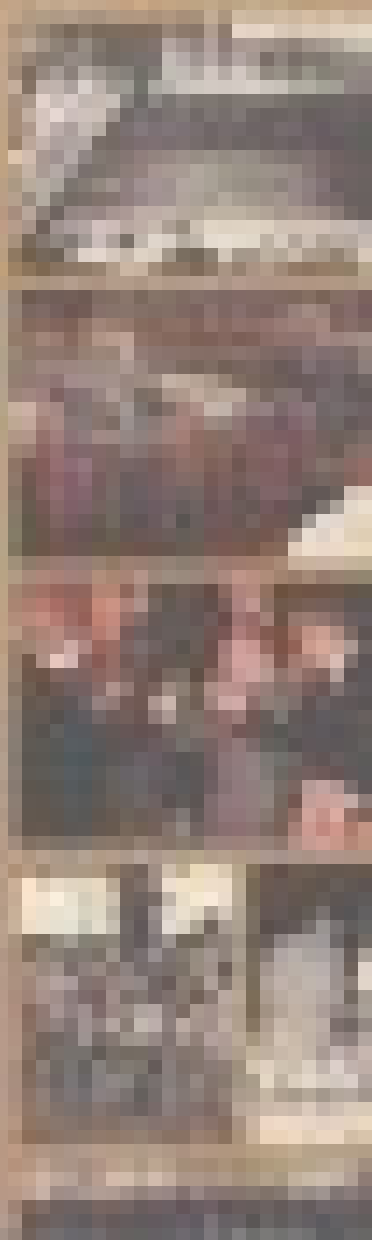
红旗出版社

第2卷



钓鱼台 档案

钓鱼台
档案



钓鱼台档案

《钓鱼台档案》编写组

• 第二卷 •

红旗出版社

斯大林举行招待会

2月8日,在所有的条约与协定开始拟定之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一起来到克里姆林宫拜访了斯大林。由于条约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双方这次会谈谈得十分投机,斯大林用最好的酒菜招待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习惯地一个劲劝人吃格鲁吉亚式羊肉汤,红采汤和烤羊肉串。

菜虽不算多,但味道可口,女侍者不停地端来热腾腾的新鲜菜肴,请斯大林过目。斯大林和中国同志边吃边谈着,当他了解到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著述丰富时,便认真地想了想,严肃地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我建议你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文章文件尽快整理出来,编辑出版,这是件大事情。”

毛泽东点点头,回答:“我也在考虑办这件事情。如果斯大林同志能支持这件事,我将十分感谢。”

“你需要哪方面的帮助?”斯大林手上的烟斗转动了一下,神色很认真。

“如果能派一位理论上强一点的,精通马列主义哲学的同志协助我们就太好了。”毛泽东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唔——”斯大林眼睛盯着杯里的红葡萄酒,沉吟了好一阵子,毅然说:“我马上派尤金同志去协助你,他是位哲学理论专家。”斯大林握着烟斗的手挥动着。

“那太谢谢您了,斯大林同志。”毛泽东说。

斯大林笑了笑,显得有些得意。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来:“斯大林同志,在条约签字以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招待会。”

“当然。”斯大林点了点头。

“但是不在我现在下榻的克里姆林宫,而是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在大都会饭店。”毛泽东明确地说。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呢?”斯大林不解了。

“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毛泽东的语气很平和,但态度却有些强硬。

斯大林显然有些不悦了,他沉思片刻,侧起头来说:“是的,可是我从来没有出席过在外边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过。”他强调了一句,显然在向毛泽东施加压力了。

毛泽东没有理会斯大林的态度,坚持说:“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恐怕是很难想像的……”毛泽东的话也显得软中有硬,他进一步说:“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参加。”

谈话停顿了下来,斯大林像在考虑什么,而毛泽东则冷静地看着他,等待着他的答复。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是这样希望的,让我考虑考虑……”斯大林终于做了让步的表示,看来他准备打破自己从来恪守的信条了,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面前这位高大健壮的中国领袖,对他来说是一位非常不一般的盟友。

会晤结束后，斯大林再次破例把毛泽东一行送到了门口，目送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斯大林手中的烟斗轻轻转了两下，若有所思。

1950年2月14日上午，中苏双方正式举行隆重庄严的条约签订仪式，它意味着两个盟国的“蜜月时代”从此要揭开序幕了，尽管谁也无法预料到两个社会主义邻国的关系以后将会遇到什么坎坷和变化，这份条约的签订毕竟给当时的世界带来了剧烈的震动。

条约原称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改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对周恩来提议加上的“互助”二字十分满意，他认为这两个字“加得很合适”。

签字大厅内的灯光格外地耀眼，大小十余盏各式吊灯挂灯壁灯齐明，更增添了隆重气氛。

条型的签字桌中央分别插着中苏两国国旗，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了字，互换文本后，两人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出席了签字仪式。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也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定规定至迟不过1952年底，苏联将交还他们在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在华权益。还签订了《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帮助新中国的建设。

仪式开始后，进程很顺利，可是当要签订贸易方面的协定时，文本却迟迟没有送到，双方领导人显然都等得有些着急了。斯大林不悦了，他问及下边，得到的回答是“中文的文本没有准备好。”斯大林不动声色，转身对中方翻译师哲说：“请您把这个情况通告毛泽东同志。”

师哲小声地对毛泽东耳语了几句，毛泽东不悦地一摆手说：“算了，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的身上行啦——”说罢，毛泽东再也不言语了。

然而文本的拖延是由于苏方工作人员的差错造成的，他们在修改错误时耽误了时间，对此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他理智地示意维新斯基再等等，一直等到文本送来后，场上的焦灼气氛才缓解下来。

签字仪式终于完结了，在全体人员合影前，毛泽东和斯大林又相互交谈了几句，彼此祝贺与问候。合影时站在中间位置的斯大林比毛泽东矮了些，他很机智地向前跨了半步，这样第二天见报的照片中，斯大林和毛泽东几乎是一样高地并肩出现在全世界面前了。

当印有照片的报纸送到斯大林面前时，他仔细地看照片，有些狡黠地笑了，似乎是在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你真聪明呀！”

然而毛泽东注意的却是报纸上消息的内容，对那张合影照似乎根本没有去认真留心过什么。

斯大林破例出席招待会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大都会饭店是一幢带有典型俄罗斯风格的建筑，2月14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把大都会饭店的宴会厅全部包了下来，整整的一层楼都成了中国东道主接待客人的场所。自然，花费的租金也是颇为可观的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结束的

告别宴会将在这里举行。

下午6时左右,中国东道主和请来的客人们都按指定时间来到了宴会大厅内,到处都是笑脸和热情的话语声,气氛是热烈而隆重的。

然而快到开始的时间了,仍不见斯大林等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出现,不少人脸上浮现出忧虑不安的表情。大家担心斯大林是否真能破例走出克里姆林宫到这儿来参加招待会。几位苏方人员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认为情况不妙,另外一些人则显得信心十足地在等待着,他们都是平常很难近距离看见斯大林的人,尽管他们的职位也不算低。

正在人们议论纷纷之时,一位身穿便服的外交官悄悄走到苏方译员费德林身边,神秘地耳语道:“您应当到前厅去迎接斯大林,把他接到这里来。”

费德林心里掂量了一下,说:“你们做这件事或许更好些,难道这种事成了我的特权吗?”

外交官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费德林同志,关于特权的事,我们现在不谈它,我们现在是把你看做汉语专家来要求的,难道您还不明白?”他拉起费德林的手就把他带到了前厅,让他在指定的位置上站好。

6时30分,一队长长的高级轿车在饭店前停了下来,斯大林带领苏共政治局全体成员走下了汽车,前来赴宴了。当前厅大门打开,斯大林威严而颇有风度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时,全场许多人都惊呆了,因为在场的大部分苏联人都从未这么近地看见过斯大林呀!

斯大林走到存衣处解开大衣,殷勤的服务员要上前帮忙,斯大林风趣地说:“谢谢,看来这点事我还会做的。”他说完跟着费德林大步走进了宴会大厅内,顿时,全场爆发出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久久不息,回荡开来……

斯大林停了停,向狂热的人们挥挥手,然后向“主宾席”长桌后面的毛泽东大步走上去,毛泽东微笑着伸出双手与斯大林亲切地握手,请他在自己旁边坐了下来。

“斯大林同志,您好!祝您身体健康!”

“谢谢,毛泽东同志,您的身体看来也不错,还适应莫斯科的气候。”

“还好!谢谢苏联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毛泽东说完话将走上前来的是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等人中斯大林尚不认识的作了介绍,斯大林也微笑着同他们问候并握手致意。

敬酒开始了,大厅内灯光辉煌,欢乐的乐曲四下回荡,两国同志一个接一个地发表祝酒词,但所有祝酒的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并排站在用玻璃板壁隔成小间内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位领袖在小间内交谈着、议论着各种问题,同以往的数次会晤一样,他们的谈话是没有题目的,高兴议论什么就谈什么,十分随便。

祝酒讲话开始不一会儿,大厅内的人流全都向小间前涌去,周恩来眼看玻璃板要被挤倒,忙叫人把它拆开,使大厅小厅合成一处,这样才使狂热的苏联人稍稍安定了一些。斯大林对人们没完没了的欢呼和兴奋看来有些厌倦了,他几次用目光向大家发出呼吁,但最终看来是徒劳的了。

首先发表祝酒词的是周恩来总理,他嗓音洪亮,没有用事先为他准备的讲稿,但所讲的内容竟和讲稿几乎一字不差。周恩来主要讲了中苏两党两国兄弟般的团结是对世界革命的最大贡献,中国人民感谢苏联老大哥的援助,要向老大哥学习等内容。他的讲话使得在场的苏联同志十分激动,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费德林有时也觉得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词汇来翻译了。周恩

来的讲话结束后,人们更关注下边的议程了,因为斯大林也要发表祝酒词了。

斯大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站了起来,显得从容不迫,他触了一下装满佳酿的酒杯,打了个手势说:“请注意,我要讲话了——”

他首先为毛泽东主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而举杯祝贺,他的语调是轻松的,他说:“中苏友好的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也代表了我的意思了。”可接下来他却把话锋一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起来,可惜今天与会者中间少了南斯拉夫的同志,我感到很惋惜……”最后,他放下酒杯,举起双手高呼着:“团结就是力量!”

宴会进程中,气氛始终很热烈,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健康,祝中苏人民友好下去。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泽东、周恩来健康,斯大林这时情绪很好,不时地与中国同志谈笑着……

这次宴会,斯大林与毛泽东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共同举起了祝贺的酒杯,尽管这酒杯的举起多少有些不容易,但它毕竟代表了50年代初中苏两国之间的“蜜月时代”到来了。

告别宴会持续到午夜,人们才尽欢而散。

李克农严斥毛人凤

台北。神经过敏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刚刚接到人民解放军即要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的情报,又接到情报部门报告:人民解放军在福建沿海已集中大批部队,空军已进驻华东的一些机场,登陆舰艇也正在一些港口集结。看来,那阵势是对着台湾来的。

毛人凤面带难色,忧心忡忡。而蒋介石这时正在阿里山庆寿。他暗自思忖,如果下一次行动成功,在毛泽东访苏归来时干掉他,中国的风云就会发生突变。否则,万能潜伏台、地下武装力量的活动将更加困难。不把握住这个时机消灭毛泽东,蒋介石不会答应!

这时,急功近利、坐阵督战的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对毛人凤说:“立即电告计兆祥,报告潜伏大陆暗杀队的准备情况,对东北技术纵队所有行动人员除重赏外,一律官升三级。并委任纵队司令马耐为国民党东三省救国司令。”

毛人凤焦虑地抽着香烟说:“按规定的联络时间已经超过了,可现在还没有得到大陆的任何反应……”

布莱德很敏感,打断毛人凤的话说:“立即电告计兆祥,停止发报,马上转移。”

“我看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共党再狡猾,也不会那么快发现我万能台的踪迹。也许计兆祥马上就会发来成功的电讯!”

北京朝阳门内路南有一个古朴典雅的四合院,它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家。这一天,肩负着侦破潜伏台第一线侦察工作重任的曹纯之,第一次到这里,汇报侦破工作。

李克农是我党我军赫赫有名的长期在“国统区”做地下情报工作的名将。他曾和我党地下工作者胡北风、钱壮飞长期在敌人的心脏与敌特进行惊心动魄的斗争,给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周恩来誉为“三杰”。

尤其是1931年,中央领导机关发生了党的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叛变事件,国民党政府如获至宝,准备将共产党分子一网打尽。在这紧急关头,由于李克农、钱壮飞、胡北风三人在周恩来

的领导下,及时掌握了敌人的机密情报,以最快的速度,将叛徒所知道的线索全部切断,从而使在上海的国际机关、中央机关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免遭劫难,为保卫党中央建立了卓越的贡献。李克农这个人,无论是自己的同志,还是敌人,都无可否认地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传奇英雄。

曹纯之虽久闻李克农部长大名,但打交道还是第一次。当他思绪未定之时,只见李克农部长已笑哈哈地从客厅走出来,热情地说:

“杨副部长向我介绍过了,同志们干得很好!老曹,从今天起,你每天只向我汇报一个问题,就是对那些接近计兆祥的人的侦察情况。”

“是!”曹纯之颌首答应。

当天上午9时,在中央社会部庄严、整洁的部长会议室里,李克农部长召集部、局、处长以上有关侦察干部会议。

一张铺着绿色台呢的长方形条桌,东西向摆放在会议室中间。

李克农以响亮的皖南口音在讲:“……对台湾保密局北平潜伏台的侦察工作,按毛主席批示的限期即将提前完成任务。敌台台长就是那个因为发了战略情报而由一个小小的中尉很快升到上校的计兆祥。潜伏电台就设在计兆祥屋内。现在就要决定破案了,但有一个问题需要统一一下认识。什么认识呢?就是搞了这么长时间,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只捕一个计兆祥,恐怕不是全胜,不是歼灭战吧?今天的会议就是统一这个认识。”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我公安机关决定逮捕集台长、报务、情报、译电四职为一身的台湾保密局“万能潜伏台”特务计兆祥。

这天,李克农部长认真地说:“小计,我这个报,你可要给我发好哇!”

计兆祥连连颌首:“是!是!”

……

“嘀嘀嘀……”计兆祥熟练地按动键杆,用以往的手法呼叫台湾保密局,并传出毛人凤接电讯的讯号。

毛人凤得此消息,高兴地眼珠一转:“来了!”

他平心静气地守在电台旁,等待接收译电。

这时,李克农部长以无可仿效的口气说:“毛人凤,经你精心策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潜伏的万能台,你向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发报只有两三次就被我们侦破了。我们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有雄厚的群众反特力量,你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你们在中国大地上洒满了怨恨,你们活动到哪里,哪里就陷入人民的包围之中,我们的专政机关就会立刻侦破你们。你们如果执迷不悟,来多少,就歼灭多少。保你有来无回。你还有本事吗?你有本事你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不要怕嘛!好好地听着: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你们有丧师八百万,逃往海岛的教训。你们现在‘寄人篱下’,好景不会长久。人民政府对你们有国人共睹的政策,立功受奖、不咎既往。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就是你新提拔的上校万能台台长计兆祥。”

毛人凤心惊肉跳地拿过译电原文又扫了一遍,不知所措。但他想最后摊牌的时候还未到,手里还有东北技术纵队这张王牌,心里踏实了些。只是眼下不知如何向蒋介石交待为好。特别是李克农的出现,更能惹怒“老头子”。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克农曾在“国统

区”做电讯情报工作，把他和戴笠整得防不胜防，处处被动挨打。国民党政府曾多次悬赏10万元，捉拿李克农，但始终连李的影子也见不着。为此，他俩多次向蒋介石下跪请罪。蒋介石气得训斥他们是：“饭桶，无用，白痴！”他们对李克农真是恨得咬牙切齿，徒叹奈何！

冤家路窄。没想到，今天在无线电里，毛人凤被李克农义正辞严地训了一通，不禁恼羞成怒！

他忽而一想，今天已命令在太平洋某半岛待命的两位特派员，飞往大陆督战，让计兆祥电告东北技术纵队准备接应。说不定，计兆祥的电报也被共产党截获，如果真是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

“该死的计兆祥！混蛋！”他绝望地骂了一声，把电讯稿猛地一摔，吓得几位女报务员哆嗦起来。

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走过来，不知所然地问：“大陆的情形如何？”

毛人凤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仍然大叫大嚷：“他妈的，共产党进了北京，比过去更厉害了！”

特务们见状，都吓得大气不敢出，小气不敢喘。

布莱德上校看了译电，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但他故作镇静地说：“还有希望，因为我们的飞机已经起飞。你要有信心，不要激动，丢掉了万能台，但是我们还有技术纵队。”

毛人凤知道美国顾问不了解中共的厉害，只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李克农部长见计兆祥发报以后不像刚才那样紧张，便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小计，今天这个报，你发得还可以，不愧是毛人凤的万能潜伏台。”

.....

李克农走到院子中间，对侦察员们说：“攻克保密局北平潜伏台的战斗，我们彻底胜利了！”

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向首长鼓掌致意！

李克农部长临上车时，对老曹说：“明天上午我再来看看同志们！”

“马司令”落网

这是一个早春的夜晚，天空黑沉沉的。

约7点钟，一架没有任何国籍标志的飞机，正悄悄地沿着朝鲜的东海岸向北飞行。它小心地绕过激烈的高射炮火网，穿过鸭绿江，又越过吉林，在离哈尔滨不远的山林里，低低地盘旋，寻找着合适的空投地点。

片刻之后，突然从飞机中部跳下两个神秘的怪物。稍顷，飞机便怪叫着在漆黑的夜空中消失了。

此时，成润之副科长、侦察员沈继宗和哈尔滨的侦察员，正等候在这里。

成润之副科长仰望着空中的两个怪物，沉着命令：“注意目标，迅速接近！”

两个怪物落到地面，收拾了一下东西，正庆幸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深入到中国大陆数百里时，忽然一道道手电筒光和一个个森严的枪口，对准了他们，他们沮丧地低下了头。

根据从计兆祥处截获的电讯证明，他们就是由台湾派来的领导东北技术纵队进行暗杀活

动的两个特派员。这两个人，曾是国民党高级刺客段云朋的助手。从他们的衣物中，搜出了美国的卡宾枪、无线电台、气象预测器、炸药等特工用具。

这两个特务叫张大平、于冠群。次日上午8点，将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与东北技术纵队接头，并代表国民党保密局，给有关人员颁发委任状，以鼓励反共有功人员。

翌日清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一个高级客房里，一位身穿蓝料子服，戴一副墨镜，留一撮小胡子，打扮得像绅士的人，独自在客房内踱步。他时而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看着临街的动静，时而焦急地看着怀表，好像是在等一个什么人的到来。

突然，门“砰砰”地响了两声。声音非常小，除非有意识听，否则是听不到的。

“谁？”穿蓝料子服的人问了一声。

“我。”门外的声音极小，“205来了！”

“请进来！”

门轻轻地敞开了，但只敞开了一半。原来门外站着三个人，除了那个敲门的中等个外，还有两人。他们三个侧着身子蹑手蹑脚地走进屋。房主人转身坐到沙发上。中等个指着身穿蓝料子服的房主人，对另外两个人介绍说：“这位就是保密局特派员张大平先生，毛人凤局长的臂膀！”

其中一个高个子立刻摘下毡帽子，朝张大平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龇着黄牙，献媚地说：“久仰！外仰！”

然后，中等个又给特派员介绍说：“这位就是东北技术纵队司令马耐，代号‘205’。”

“噢！请坐！”特派员稍微欠了一下身子。

马司令看了看特派员的脸，小心翼翼地提起他的半旧棉袍坐在靠近特派员的沙发上，然后用手擦擦脑袋上的汗珠，假惺惺地说：“昨晚受惊了吧？兄弟未能亲往迎接，失敬，失敬！”

特派员点头表示体谅，然后站起来说：“我奉国民党保密局毛人凤局长命令……”室内空气立刻严肃起来，马司令把脖子挺得溜直，听特派员宣布：“……蒋委员长的飭令，此仗不成功，便成仁。所有行动人员除重赏外，一律官升三级。”

马司令松下一口气说：“多蒙党国关照，请特派员指示！”

特派员一挥手让另外两个人到外边去。

特派员说：“马司令，谈一下行动的准备情况吧！”

马司令得意洋洋，往沙发上一靠，吹嘘起来：“这次中共访苏，共党防守极严，沿途及车站军警岗哨林立，还有便衣、地方干部都参加巡逻。我们给共产党灌了个迷魂汤，让他走时安然无恙，回来时粉身碎骨。”

“你们的行动计划是否可靠？”

马司令压低声音说：“根据北京潜伏台指示，毛泽东专列明天晚上8点可到达哈尔滨。我们拟在满洲里、哈尔滨、长春举行三次行动。作战计划是分三路进攻。一路从正面攻击，打个快速歼灭；一路从背后堵击，防止他们撤退，剩下的一路迎击中共援军。事成之后，撤退到长白山区，建立武装游击根据地，只等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来，就可迎接国军到来！”

“有响货吗？”特派员问。

“当然有。都是香港送来的黄色烈性炸药。明天，我就派人去哈尔滨市郊铁路埋炸药。到时候，炸药一响，把他们的专列打个一塌糊涂，叫他们签订什么中苏友好条约，建立什么反帝联

盟，统统见鬼去吧！”说完，马司令嘿嘿一阵冷笑。

特派员点点头，担心地问：“行动计划都有谁知道，他们不会变节吗？”

狡猾的马司令不讲谁知道，因为他对特派员还有点戒心。

特派员要挟地说：“这次行动成功，立刻就发委任状，论功行赏！”

马司令一听，故意不回答第一个问题，而回答第二个问题。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脖子说：“我手下的人都是一手接派令，一手提头颅的人。我们报效党国，脑袋丢了也不会变节！”

特派员早已明白马司令的意思，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这次来，就是代表国府发委任状的。你不讲多少人，不讲组织成员都是谁，我怎么向上级报告，给你们请功？”

想到发委任状，马司令不由得心花怒放。炸了毛泽东的专列，风云突变，大陆就是国民党的天下，他就是堂堂正正的国军司令。到那时，要女人有女人，要枪有枪。于是他便和盘托出东北技术纵队人员名单：“这是组织成员联络图副本，共170人。”

特派员看了看，将副本装进自己的衣袋，说：“到时，我就按这个单子点名！”

马司令操纵的这个东北技术纵队，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秘密武装。保密局在全国有三个技术纵队，一队在南京，一队在广州，一队在哈尔滨。所有的敌特均经过中美合作所严格的技术训练，都能熟练地掌握射击、爆破、投毒等特工技能。他们是“全五行”的杀人魔王，专门从事重大暗杀、爆破等恐怖活动。解放前，这支人马大部分打入国民党起义部队，经过改编混入我人民解放军，另一小部分则散落在社会上，隐蔽下来，伺机行动。

谈话进行了一点一刻钟。

该是收场的时候了。特派员看了看表，对马司令的谈话感到满意。

这时，那个中等个子的人敲了敲门，从外边走进来，把一张纸递给马司令，并很幽默地说：“马司令，你不是准备要委任状吗？我现在就发给你！”

马司令喜出望外，接过来一看，不是委任状，是逮捕证！

特派员笑了，问马司令：“司令先生，还有什么话没说完？”

说着，特派员把眼镜一摘，小胡子一薅，原来是成润之扮演的特派员。

翌日清晨，李克农部长准时来到侦察科现场指挥部云南会馆。

云南会馆这个幽雅、古老的庭院，充满着蓬勃生机；公安部侦察科全体参战人员，以及北京市公安局一队部分侦察员，早在门前列队欢迎。

老曹快步向前迎接李克农部长下车。同志们高声说：“首长好！”

李克农部长一边走一边挥手说：“同志们辛苦了！”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进入客厅后，李克农部长招呼大家一块儿坐下，然后问：“老曹，这就是你的破案指挥所吗？”

老曹回答：“是！”

“那从今天起，就不是华北贸易货栈了。”李克农部长幽默地说完，接着问：“东北的情况如何？”

老曹说：“已经来电，一网打尽了！”

李克农部长更加高兴：“老成回来，我亲自给他们接风！”

由于李克农部长平易近人，说话风趣，不少同志又与他见过面，所以都能自动给他倒茶、递烟、送糖，无拘无束，显得很亲热。

高兴之下，老曹一时忘了请同志们向李克农部长作自我介绍。

李克农部长指着对面的外线侦察组组长辛立学问老曹：“他姓什么？”

“他姓辛。”老曹答。

李克农部长用英语风趣地说：“不！”接着用普通话说说：“他姓张嘛！”

老曹还没有明白李克农部长的意思，只是笑了笑。

李克农部长说：“嗨，他叫张飞嘛！”说完，又，指着侦察员任洪友问：“他姓什么？”

老曹答：“他姓任。”

李克农部长还是用英语说：“不！”接着用普通话说说：“他姓李！”

老曹赶紧说：“噢！我明白了，他叫李逵！”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李克农部长说：“不再问了。如此爽朗的笑声，就是自我介绍了。你们这个队伍的同志，都是智勇过人，立场坚定，胆大心细的好同志！”

同志们纷纷说：“不敢当！”

老曹也说：“部长过奖了！”

李克农部长说：“同志们干的好哇！为侦破此案，老曹之所以敢立军令状，原来，你们有这么多张飞、李逵保驾呀！”

同志们没有等李克农部长再夸奖下去，辛立学代表大家说：“都是部长亲自领导，我们天天都能听到部长的指示，才打了胜仗！”

“哪里！哪里！我和你们杨副部长，也和你们曹科长天天向我们汇报一样，我们也是天天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汇报。是党中央、毛主席天天在关怀着同志们的工作哟！”

李克农部长的话激起大家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登上归程

午夜过去了，莫斯科沉入了梦乡之中。”当——当——”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的大钟钟声又深沉而悠扬地响了起来，宽阔的广场上已没有了人迹，天空中飞扬的雪花仍在静静地飘洒着。广场尽头处那座高耸的石座上竖着一块铁铸的纪念碑，这是纪念罗曼诺王朝帝王亚力山大二世的铁碑。此刻，这座古迹仿佛作为见证人，站在这静悄悄的夜晚里，向历史诉说着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和苏联之间这段不寻常的经历。

在这寂静的深夜，已完成了重大历史使命的周恩来却还没有功夫休息，他在房间里向工作人员一一布置着回国前的事项。他亲自清点带来的礼物清单，其中送给斯大林的是中国绸缎和屏风，其他领导人的也是绸缎刺绣之类的物品。周恩来还特别仔细地检查了分发给所有苏联工作人员服务人员的礼物，包括没有见过面的人也是一人一份，全都写上了名字。

分发完毕后，周恩来还再三叮嘱工作人员，“不要漏掉了一个人。”

第二天，当这些普普通通的苏联工作人员接到礼品时，好多人禁不住激动得大哭起来了。

启程的日子到来了,2月17日,中国代表团要离开莫斯科回国了。这天早晨,毛泽东早早地起了床,他同往日一样,动手把自己的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又把房间整理了一遍,然后点着了一支烟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把这房里的一切看了看,像是在同它们告别似的。

门轻轻地推开了,打扫卫生的女服务员端着水走了进来,她一见毛泽东早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了,不由得一阵激动。几乎每天都是这样,毛泽东总是自己收拾房间,这使那些长期在斯大林身边服务的人员感动不已,今天毛泽东要走了,仍然早早起来收拾好了房间,女服务员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她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鞠了一躬,不由得哭出了声来。

毛泽东笑着拍拍她的肩头说:“我们要走了,欢迎你到中国来做客哟——”

分别的时刻到来了,苏方全体服务人员全都赶来送行,不少人哭红了眼睛,他们觉得毛泽东和周恩来比起斯大林来,要亲切朴实多了,短短两个来月,中国领导人已和他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莫斯科车站广场上人头攒动,前来送行的苏联同志早就等候在这里了,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来向毛泽东送行,他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斯大林同志让我转告您,请您一定注意保重身体,在路上,在国内都应该保重。此外,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能大意,这是斯大林同志再三让我告诉您的。”莫洛托夫说这话时神态很认真,斯大林晚年性格中那种多疑,总感到自己周围有许多幽灵,这种心理状态也影响着像莫洛托夫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在他们眼中,权力是神秘的,权力的力量应当使人捉摸不透……

可毛泽东似乎与苏联领导人有很大的不同,他并没有把自身的安全看得多么重要。他握了握莫洛托夫的手,笑着回答:“感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也请您转告我对斯大林同志的问候。”

长长的汽笛声划破长空,专列徐徐驶动了,与毛泽东同车返回北京的周恩来等人,从窗口探身向送行的苏联同志挥手告别,人们彼此久久地挥着手,直到列车远去。

阳光从云层中探出了头,洒在大地上,2月的风已有了一丝暖意。车窗外,远处的雪线在慢慢上升着,渐渐显出了一片新绿,人们似乎感到了春天将临……

2月26日,毛泽东和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到了我国边城满洲里。毛泽东到达满洲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斯大林发出了致谢电,周恩来总理也向维辛斯基外长发了致谢电。

(李健:《钓鱼台国事风云》)

伍修权的回忆

毛泽东主席1949年12月访问苏联的主要目的是庆贺斯大林70寿辰,同时签订条约。去后,斯大林很客气,但仅仅是一般礼节上的客气,并没有打算签订条约。斯大林开始为什么不愿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呢?这是斯大林考虑不周,他开始只考虑毛主席去莫斯科就是为了给他祝寿。这是个事实,但不能太简单了。当然苏联也考虑到它曾与国民党签订了一个条约,有一定约束力。从抗日战争胜利到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到东北时,苏联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怎么样让国民党接收东北,保证1945年条约的实施。同时,苏联也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打得太苦了。毛主席对斯大林的态度很不高兴,说斯大林太简单了,“我毛泽

东来莫斯科就是为给你斯大林祝寿吗？”所以后来发了脾气。当时，苏方派费德林当联络员。在费德林问毛主席生活得怎么样时，毛主席当着他的面发脾气说：“我什么事也没有，一天就是三件事，吃饭、拉屎、睡觉”，公开表示不满。费德林向斯大林反映了，回头再问毛主席对中苏关系有什么想法。毛主席说，希望搞个“又好吃、又好看”的东西，但没有明讲。费德林又反映给苏联领导，苏方包括斯大林在内都发懵了，摸不清什么是又好吃、又好看的东西。这时王稼祥同志起了作用。他去摸了毛主席的底，毛主席说把我弄来就为祝寿，未免太简单了嘛，应该搞个政治文件。王稼祥心中有了底，就以大使身份去苏联外交部点破了这个问题，说毛主席到莫斯科已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考虑中苏之间签个文件。苏方反应很快，同意签个文件。斯大林还建议说：“就由我和毛泽东同志签字。”毛主席提出反建议说：“你是部长会议主席，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文件，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苏方同意与周总理进行具体谈判，于是毛主席打电报请周总理即去莫斯科。

这时，我正在湖北老家探亲。周总理打电报到我老家，叫我立即回京。我到北京后即向周总理报到。这时李富春、叶季壮等一大批人都到了。我是以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名义参加的。出国制装也来不及了，于是我便在旧货摊上买了两套西装，一件大衣，一顶高加索帽子，就随周总理等乘火车出发了。在火车上，周总理与毛主席取得了联系。周总理写了一个到莫斯科的讲话稿，叫我翻译成俄文。我翻译后给车上的苏联同志看，他们说意思翻得对，就是有点象中国式的俄文。到达莫斯科时，苏方派米高扬等来车站迎接，周总理发表讲话，我当翻译。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很快就谈好了。同时还商谈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贷款给我国等两个协定。根据贷款协定，苏联决定贷款三亿美元给我国，作为购买苏联机器设备之用。苏联缺乏稀有金属，特别是钨、锑等，在条约附件中讲清楚了，我们每年要向苏联提供多少钨等稀有金属。条约谈好后，签字用的笔墨是由我亲自送到克里姆林宫签字地点去的，签字的日期是1950年2月14日。

条约签订后，有两件事值得回忆。一是签字后，王稼祥大使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庆祝，要请斯大林参加。我们曾考虑斯大林的气派很大，不知他是否肯参加，后来他还是参加了。斯大林到会后，气氛非常热烈，招待会开得很成功。二是斯大林2月16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参加的人只有三四十人，是个长方桌。我与库兹涅佐夫坐在一起。宴会中斯大林兴致很高，不断同客人谈话，甚至开玩笑。这里有个故事。席间，胡志明主席很羡慕中苏签订的条约，他向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也要向你请示。”斯大林笑道：“你怎么能向我请示，我是部长会议主席，你是国家主席，官比我大，我应该向你请示。”胡志明接着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同中国同志订了个条约，趁我在这里，咱们也订个条约吧！”斯大林说：“你是秘密来的，怎么同你订约？否则人家要问你是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呢？”胡志明幽默地说：“这很简单，你派架飞机把我送到天上去转一圈，然后再派些人到机场迎接我，在报上发个消息不就公开化了，然后我们两国就签订条约嘛。”斯大林不好回答，讲了一句笑话说：“你们东方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在中方的积极争取下签订的，有效期为30年。应该说，从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起的宗旨来讲，当初是起过作用的。条约签订后毛主席、周总理都回国了，李富春与我留下来同米高扬谈经济问题。其中关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问题，苏联恃强压人，不按一般国际惯例，根据主要产品价格综合平衡，得出指数，找出差距，确定比值，而是采取抬高卢

布比值,压低人民币比值的办法,要我方同意。我们很不高兴,发生争执。经请示中央,中央说照顾大局吧,最后作了让步。李富春同志领导的经济谈判于4月结束后,我们就回国了。

听说毛主席到莫斯科后,斯大林还讲了“过去我们对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感到内疚。”这句话从斯大林嘴里讲出来是不容易的。

关于旅顺口与大连问题。旅顺口是清朝政府租让给俄国的。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斯大林曾想能把旅大保持多长时间就保持多长时间。旅顺口确实是很重要的海军根据地,而苏联在旅大驻军又与共同使用中长铁路连结在一起的,因为它要运送给养和物资。

按照中苏签订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苏联应将中长铁路的经营管理权、旅大的苏军根据地及其设备,全部移交给中国政府。而苏方坚持要在对日和约签订以后交还,最后协议至迟不超过1952年底以前移交。以后为什么旅大没有如期交还呢?因为1952年朝鲜战争还未结束,我国政府主动建议苏军继续驻守旅大,什么时候交还,以后再作商量。1953年2月,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前往旅大慰问苏军,7月朝鲜停战,1955年苏军从旅大撤离。

苏军撤走后留下来的武器算了钱。以后有人议论说,苏联撤走后留下一堆破烂,还要了我们很多钱。这句话我们应该加以分析,不完全客观。你说它是一堆破烂嘛,它不全是破烂,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武器。你嫌它是破烂,你可以不要嘛!要钱多了,你可以讨价还价嘛,为什么这样冒失呢?现在我们应该客观一些看这件事。究竟应该给多少钱,我们当时又未主动提出来,我们也有责任,不能都推在别人身上。

(伍修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毛泽东举行告别宴会

费德林有关毛泽东举行告宴会的回忆是鲜为人知的,他写道:

斯大林同毛泽东的每次会晤都是突然性的,没有事先通知。谈话没有确定的和公开的议程。内容完全由主人掌握,但他从不事先透露谈话主题。一般情况下,谈话总是从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开始。或者是客人随兴而问,或者是主人谈及某个问题。

例如,有一次讨论到语言和思维问题。斯大林概要地表述了他那篇众所周知的关于语言问题的文章内容。大意是,语言作为表达思维的工具同人的阶级属性关系不大。任何人都可用任何语言说话,既可以用普希金的语言,也可以用托尔斯泰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语言,一切取决于教养和个人的爱好。

毛泽东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汉字和汉语尽管掌握起来比较难,但是对所有的人开放不管社会地位和阶级出身如何只要愿意学,就可以学到手,精通起来也不难。至于是否每个中国人都能获得必要教育,自如地运用文字,那是另一个问题。他说我就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可我照样掌握了汉学和汉语。

“费德林同志,”斯大林对我说,“请你把盘子递过来。”

我走到他跟前,他像往常一样,眼睛看着别处对我说,“你来尝尝这个菜。难得有的,恐怕

你从来没吃过哩。……说不定，是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他加上一句，眼睛仍然望着别处。我心里嘀咕，为什么要扭转脸说话呢，难道我就这么让他讨厌吗。平时人们交谈，总是望着对方的眼睛，这是一个基本态度。眼睛也是会说话的，起码有助于理解。

我感谢他的款待，但是并不感到快活，心里老是忐忑不安。女服务员上菜时，同主人悄悄说了几句，她没有把这个菜撤到摆餐具的小桌上而是留在斯大林身边，我却似一只受惊的寒鸦，警觉地注视着他们。

“费德林同志，味道如何？这个菜你喜欢吗？”斯大林马上就问我。

“对不起，斯大林同志，我，我……”我紧张地勉强说了一句，“做得很精美……”

牙疼不等于没有胃口。

“那你为什么不说话？”他没有责备之意，我却仿佛被戴着羊皮手套的手轻轻抽了一下。

这个菜确很好吃，火鸡的肝，加上辣椒和盐，完全是高加索风味。不过中国有句古诗：“醉翁之意不在酒……”虽然款待了我，我仍然惶恐不安。

一切总算对付过去了。我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结果还算好，没有恶意没有中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自有分晓，人们不应互相猜忌，人为地制造嫌隙。

由此，我想起毛泽东 1957 年访问莫斯科时发生的另一件事。

一个急迫的公务电话使我匆匆赶到毛泽东落脚的克里姆林宫。一位佩戴着高级军衔的警卫队队长接待我，焦急地说：

“副部长同志，毛泽东的私人厨师同我们闹别扭。我们送去的鱼他不肯收，也不肯做……”

“别搞形式了，直截了当地说，究竟怎么回事？给的是什么鱼？”我问特别勤务连的那位上校，他本想检查我的级别，以鉴定我是否有资格处理此事，主要是能否帮他解决问题。

“我们每天都给贵宾送一条鲤鱼，”他急急忙忙地说。

“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那厨师一个劲儿地摆手，“不肯要，搞得很不愉快……”

他全身挺得笔直，好像吞下了一把铁锹。

我向中国厨师问明原委。

“这是一条死鱼，也不知死了多久，我这里有规定，给毛主席做菜必须用活鱼。”厨师长操着一口好听的北京话。

一个简单的误会，却在我们特别勤务连引起一场风波。

“什么？就为这点儿小事？”上校吃惊地说，“这好说，我们马上抓条活的来……”

谚语说，植树不嫌晚，果实送给别人，快乐留给自己。

过了一段时间，1949 年 12 月早已流逝，1950 年 1 月也匆匆而过。2 月份，便是签订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日子。

“斯大林同志，我们打算在条约签字后举行一个小型招待会，”毛泽东在一次例行会晤时提出这个要求。

“好啊，”主人说。

“不过，招待会不打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我们打算找别的地方，比方说，在大都会饭店。”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呢？”

“因为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那里办恐怕不合适……”

“这倒也是。不过我从不到饭店或外国使馆去参加宴会。从来不去……”

“啊，斯大林同志，你不来怎么行呢，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同意。”毛泽东恳切地说。

斯大林沉吟不语，毛泽东两眼盯着他，盼着他的答复。

“好吧，毛泽东同志，您这样希望，我去参加。”斯大林终于同意了。

斯大林就这样打破了常规。

2月14日，中方按预定时间在大都会宴会厅举行盛会，尽管气氛隆重，但是许多人流露出焦躁不安的神情，他们担心斯大林是否会应诺出席。不少未卜先知的牛皮客不无自信地作出了悲观的预测。反正，热衷于揭露性批评和传播小道消息的专家是永远不会缺少的。与此相反，另外一些人则抱着乐观态度。不管怎样，大家都急不可耐地盯着入场的大门，焦心地期待着。……大都会宴会厅的气氛十分热烈。这时，一位资深的便衣人员走到我跟前，煞有介事的样子，用信任的口吻对着我的耳朵说：

“你到前厅去迎接主人，把他带进来……”

“请问，我有这个特权吗？还是像过去一样，由你来领吧？”我回答那位上校，他的面孔我早已看熟。

“别忘了，你知道你在同谁讲话吗？……”

“我猜到了。”

“那就别提什么特权问题，咱们下次再来解释这问题。我建议你别这样同我说话。现在你是中国问题专家，才这么要求你，难道不明白吗？”对方命令式地说。

我不想同他争辩，不过还没有弄明白，难道我要用中文来同斯大林解释吗？对于这样的人，可以说，没有学会走路就想学跑步。

他挽着我的胳膊走到前厅，告诉我该站在什么地方，“注意看着门口”。周围没有人，只有存衣室的服务员守在挂衣架旁边。

不久，前厅的大门开了，斯大林像镜框里的肖像一样站在门坎上。他对着前厅扫了一眼，发现了我，便不慌不忙朝着我这个熟悉的目标走过来。

他走到存衣处，解开大衣扣。殷勤的服务员像弹簧一样跳到他跟前，谦恭地说：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请让我帮您……”

斯大林瞧了他一眼，客气地向他问好，然后微带讥讽地说：

“谢谢你，不必了，脱衣服我自己会的，”他朝我丢了个调皮的眼色。

脱了大衣，他走到挂衣架前挂好，又把制帽搁在架上，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问我：

“里面的情况怎么样，人都到齐了吗？”

“是的，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国朋友早就来了，都在等着您呢。”

“那么好，带我去吧。”说着，他用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于是我“领着”斯大林……走进宴会厅。迎接他的是热烈的掌声和一片欢呼声。所有的人，无论是悲观消极论者还是谨慎的乐观派都是一片雀跃。